



幸运中选

当1972年来临之时,我的情绪正处于低落期。总统中国之行的日期被定在2月21—28日。国务院的代表们已参与了1971年10月基辛格博士第二次更为公开的北京之行,其中最著名的包括中国大陆事务处主任艾尔·詹金斯。但国务院秘书处却无缘参与。1月份,基辛格的副手亚历山大·黑格准将已率领一支技术团队前往中国。1月21日周五的早上,卡森从国务卿行政办公室返回,他说:“擦擦你的皮鞋吧。你的运气来了。国务卿正考虑找你谈话。他可能在今天或周一的任何时间找你。”我开始等待。

下午六点,电话铃响了:“立刻到国务卿办公室来。”我偷偷用裤脚擦了擦皮鞋,匆匆穿过大厅。罗杰斯的秘书麦琪·罗克尔(她是确定会随行的人员之一)把我带进一间有点死气沉沉的房间,罗杰斯国务卿独自一个人在里面。罗杰斯友好地向我致意,让我坐在沙发上,并问起我的中文语言背景。我用几段精心准备的言辞,概述了自己在华盛顿和台湾所接受的培训,以及自己在中国香港中国事务处、情报研究和秘书处的工作情况。“我正在寻找一个中国之行的助手,这次访问,我需要一个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人。”

我向他介绍了自己在被选派参与秘书处工作之前,投身中国研究

中美关系中的“中国男孩”(1)

卜励德

卜励德大使是一位亚洲通,中国问题专家。他曾于 1972 年陪同尼克松访华;1973 年作为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美国驻华大使馆前身)首批官员之一,出任联络处的政治部主任。本书是卜励德的自述,最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报选摘其中的几个章节。

10年的经历。“这次任务非同寻常。”罗杰斯插话道。“我能帮上忙。”我说。“不要指望什么,”罗杰斯用这句回答结束了面试,“过几天我会通知你。”面试总共只有四分钟。

周一下午,泰德·埃利奥特把卡森和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说:“看来你们要出趟差了!”我们兴奋地欢呼并握手道贺。随后,我立刻给中国事务处的艾尔·詹金斯和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打了电话,对我将参与这次不同寻常的旅行,他们都表示高兴。

平静抵达

我们在2月的一个阴天抵达上海,从空中可以看到运河交错的稻田和村庄。机场上空空无一人,仅有寥寥几位官员,与广袤的土地相比是如此渺小。舷梯的尽头站着儒雅的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章文晋和稍显拘谨的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后者以担任毛泽东的翻译而闻名。他们两位都是基辛格之行的的重要人物,在美中建立新外交关系的初期也是关键人物。何志立和詹金斯认识他们,并做了简单的介绍。在空荡的候机楼中,我们手捧着茶和糕点,注视着空军一号着陆,这是历史性的一刻。这一刻,寂静无声。

在一番短暂休整之后,我们在中国飞行员的带领下,穿过宽广的停机坪,回到我们的飞机上。而这些飞行员,则是我们在上海停留的真正原因。机场周围的农田里隐隐飘

来粪便的气味,与我们在台湾闻到的气味极为相似,这是我终于来到中国的确凿证据。这也许不至于让我激动到亲吻脚下的土地,但我确实感受到了一种极大的感官刺激。

北京的天气晴朗而寒冷。和上海的情况一样,机场上空荡荡的,只有两列极为高大、训练有素、装束威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和零星几位文职官员。可惜不允许我们飞机上的人和他们站在一起,浪费了一次照相的好机会。在尼克松总统的座机慢慢停下之后,我们被带到了飞机左翼后面的一片区域。在波音707引擎下,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仰视角度,拍下了尼克松与周恩来总理历史性握手的照片。

尼克松总统很清楚他此行的分量。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曾在多年前的日内瓦会议上傲慢地拒绝跟周总理握手,这事家喻户晓,现在尼克松希望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知道他决心要纠正这个错误。他甚至特意把其他人都留在客舱中等候,只和他的夫人帕特一起在一片静寂中走下舷梯,他认为这样的场合需要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开端。

在简短的仪式之后,我们迅速加入了车队,一长溜上海牌的绿色小轿车跟着数辆红旗牌豪华大轿车,这是中国自己制造,可以媲美加长凯迪拉克或奔驰的车。在进入首都的路上,我和约翰·托马斯一起看着平坦的农田,时不时可以看见小型工厂和路边一排排的小树。我们

的车在城中穿行,进入了天安门广场,天安门的城门上挂着毛主席的巨大肖像。我很想知道中国人都跑到哪去了,一路上都看不到人影。只有向飞逝的路边瞥一眼,才看到公安人员用警戒线把好奇的围观群众都拦在半个街区之外。

紧接着我们到了钓鱼台国宾馆,这是一片大型的俄罗斯风格别墅区,别墅的天花板很高,房间里摆着很多柔软的座椅,椅背上罩着装饰用的椅罩。我打开行李,熟悉了一下周边情况。包括国务卿在内的国务院代表团被单独安排入住一幢独立别墅,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代表团则在附近的其他楼里。我在通讯室里收了一下邮件,然后和我的组员们一起吃了饭。这是全世界最美味、服务最好的中国餐厅,看来这次访问我一定会增重不少。

未见毛泽东

午饭之后,我们本应该参加一个全体会议来开启双方的各项谈判,但会议突然被推迟了,我们等了又等。半路插进的是毛泽东和尼克松的重要会晤,由于毛主席每天的健康状况很不稳定,会晤是在他状态比较平稳时被临时安排的。亨利·基辛格和温斯顿·洛德(作为记录员)陪同尼克松参加。国务卿没有参与这次会议,并且据我所知,他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记者们对此大肆渲染,仿佛是基辛格在与罗杰斯长期的争斗中,对他的又一次羞辱,而

我们也无法解释这件事。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坚持说,是中国人想要小规模会晤,并且尼克松无论如何也不想让罗杰斯参与,不过他在《白宫岁月》这本书中,为没有坚持让国务卿参与而道了歉。罗杰斯一直表现得很成熟,他们没有抱怨这件事,甚至没有向他们任何人提起过。

撇开会谈参与者的问题不谈,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晤对于这次访问的成功非常重要。这跟以往总统对其他国家的访问不同,以前从来没有为国家领导人之间的见面专门挤出时间,尼克松去中国的时候并不十分清楚他什么时候可以见到毛泽东。毛主席同意会谈的消息来得如此之快,如此明确,使得中国人放下心来,并为未来的合作铺下了坚实平坦的道路。推迟已久的全体会议终于在傍晚举行,这仅仅是走一个形式,谁应该说什么,应该在哪个字,这些事情早已决定好了,接着我们就前往天安门广场旁的人民大会堂参加欢迎宴会。

与长者共进晚餐

所有参加的人都不会忘记这次宴会。人民大会堂之巨大让人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一部电影场景中的蝼蚁。总统一行的每一个人都被邀请,包括机组成员和行李员,宽阔的楼梯上挤满了激动的人们。有人在楼梯顶的正面看台上对这次正式宴会进行拍摄,我们可以听到音乐从巨大的宴会厅中传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乐队就坐在大厅入口处的升降舞台上,穿着宽松的制服,以高超的技巧演奏着纯正的美国民歌《稻草里的火鸡》。大厅十分明亮,中美两国的国旗并排悬挂在上空,极其引人注目。

绝响：永远的邓丽君

姜捷

11.邓妈妈就是最好的经纪人

不到一年的时间,邓丽君就以票房实力受到重视。不只在歌厅、夜总会唱歌,还有餐厅、大饭店开幕等喜事,邓丽君都是争相被邀的排行榜前几位。东南戏院附近的“夫人餐厅”邀她剪彩;台中远东百货公司开幕,在剪彩之后,还尽兴地逛了全新的百货公司,开心不已;全省走透透的她也南下高雄为“今日育乐公司”剪彩,顺便带着妈妈“血拼”一番。有段日子,她们母女俩还会买一式一样的母女装来穿,乐得不得了。她初尝受尊重、受宠爱的走红滋味,也体认忙碌与充实的双重感受,她喜欢把每一天都过得踏踏实实。之后,她在台北“七重天大歌厅”、“台北大歌厅”驻唱,在中坜“环球饭店”客串,在“台中大酒店”献演,在高雄“香宾厅”登台,甚至在嘉义“豪华歌厅”客串演出,都打破这些歌厅原本的票房纪录。即使在狂风骤雨袭击的台风日,她的秀场都还维持七成以上的卖座,魅力可说是风雨无法挡,是当时秀场最红的一棵幼苗,可塑性极大。

邓丽君没有能力请经纪人,体贴的邓妈妈就是最好的经纪人。出道以来,她一直陪着邓丽君全省东奔西跑,虽然赚了一些钱,这样马不停蹄地奔波却也是苦事。可是自己的孩子出了名,邀请的人渐渐增多,有些还托人情、讲面子,不去也不行,邓妈妈深深了解她的体力、精力状况,许多广告之约或太耗损精神的演唱活动,能够不接的,邓妈妈只能扮黑脸出面回绝。

刚出道的时候,邓丽君也接一些电视广告来拍,一支广告一拍几乎要用掉一天,酬劳不过几千块,很不划算。名作家爱亚回忆她的先生周亚民在担任导演时,请邓丽君拍了一支广告,活泼、甜美的她当然表现称职,广告拍出来的效果大家也很满意。过了三年,想找她重拍第二支的时候,邓妈妈把她的价码一下子跳高了六七倍,他们只好忍痛放弃。非常重视家人的爱亚对这件事很不以为然,她认为一个小女孩并非摇钱树,为什么要定



价码来物化她?同时,报纸上也曾暗讽:“全家经济都要靠她小小的肩膀,哥哥、爸爸难道不能分担吗?”

那时,邓丽君的大哥正好在报馆当记者,二哥去商船服务,三哥在军校读书,家中环境改善很多,家中有房子,两老过得很简朴,完全不需要靠邓丽君养家,纯粹是因为歌迷喜欢她,愿意听她的歌,喜欢她的表演,而她的事业正起步,人正如日中天地走红,没有放弃演艺生涯的道理。舆论把她塑造成被全家欺压的摇钱树,对她家人攻击并不公平。她在当红的时候一直唱下去,只是单纯想服务视听大众,冲刺自己的事业往国际发展,家人只有支持,怎么可能逼迫?唯一可能造成这种臆测的,只能说邓丽君的确很孝顺,她的钱一直是交给爸妈,很少自己随便花用,但媒体把孝心解读成被欺凌、被压榨,母女俩都不多作辩解。邓丽君和媒体的关系一直不错,有一回,碰到那位写这样报道的记者,她也只是开玩笑地对他说:“这位大哥,我是成年人诶!”幽默化解了尴尬,这是她面对八卦寻求生存之道所磨出来的另一种智慧!

但不管再忙再累,邓妈妈绝不会帮她挡掉的是义演,无论多忙,她都一定会参加,随成功岭访问团到台中晚会,她的《一见你就笑》《甜蜜蜜》《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等轻快小曲儿,都让观众为之倾倒。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愛你有几分/你去看一看/你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由翁倩清作曲、孙仪作词,发表在1973年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是后来被邓丽君唱红的一首歌,词意简单,感情真挚,曲调容易上口,几乎大街小巷人人都会哼唱。在2000年,全球票选最佳华语歌曲,这首歌高居榜首,这个奖的意义不只是为了这首歌好听、耐听、历久不衰,也说明邓丽君在人们心目中的不坠地位。不论她走了多少年,即使歌坛的香港天后、本土天后、平民歌后、大陆天后辈出,唱片销售量也惊人,但人们在慎重票选自己所喜欢的歌曲时,还是念念不忘一个最能打动心灵的声音——邓丽君,以及她娓娓道来、柔柔倾诉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7.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由于炎热出汗,欣荣、水波身上长满热疮,他们祈求老天能下一场雨。也许真是他们的虔诚和祈祷起了作用,夜晚,两人刚睡着,天边电闪雷鸣,接着下起雨来。噼噼啪啪,粗大的雨点落在救生筏篷顶上。

“快拿瓶接水。”欣荣让水波拿盛水的瓶。欣荣将筏顶上一只塑胶螺丝拧开。原来那儿有个洞,像个漏斗,专门用在下雨时搜集雨水。清澈的水顺着漏斗哗哗流下来。水波递瓶,欣荣接水,很快将十几只大肚子塑料瓶装满。

经过雨水洗涤,天空和海洋清澈透明。此时,一轮满月像只大银盘挂在黛色的天幕上,酷热消退,微风轻拂,水波不兴。印度洋像一匹深蓝色的绸缎宁静地躺在夜幕下。

第51天,傍晚发生一件不幸和可怕的事。欣荣像往常一样钓鱼,鱼上钩后他慢慢往上拽,待鱼出水时他弯腰想伸手去抓,但水波动作比他快,一只手先伸出去。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当儿,只见一条黑影呼地蹿出水面,一口咬住水波的右手手臂。那是一条凶狠的大虎鲨。“啊!——”水波惨叫。鲨鱼使劲将水波往海里拽。

欣荣用拳头使劲击打鲨鱼。此时一大群鲨鱼赶来助战,在救生筏周围翻腾,搅得海水像开了锅似的,有的还撞击救生筏。欣荣知道此时水波若被鲨鱼拽下海,顷刻间就尸骨全无。他急了,用手指抠鲨鱼眼珠。鲨鱼被激怒,猛地将水波的手臂松开,却一口将他的手咬住。“啊!——”他痛叫。鲨鱼咬住他使劲向海里拽;他则弓着身子往后缩,人与鱼进行一场拔河比赛。水波顾不上流血的手臂,怕欣荣被鲨鱼拽到海里,双手从后面抱住欣荣的腰。“小波,快,拿桨打它。”欣荣呼叫,“打它头。”水波操起木桨,猛击鲨鱼脑袋。“用力,使劲。”欣荣喊。水波咬牙,使出全身力气。一下、二下、三下——鲨鱼也抗不住了,不得不松嘴;但心犹不甘,最后却报复性地使劲狠咬一口。

欣荣解脱了,但右手除大拇指外其余四个手指连同半边手掌都被咬掉,鲜血淋漓,惨不忍睹!“啊!——”水波惊愕得哭起来。“别哭。”欣荣疼得龇牙咧嘴。他用左手捏住伤口,

吩咐水波,“快将急救药箱取出来。”

水波取出药箱,里面有纱布、药棉、碘酒、红药水和消炎粉。水波将红药水和碘酒在欣荣伤口消毒,再洒上消炎粉,然后用纱布包好。水波右手臂背上有三个鲨鱼牙印,伤口在流血。“小波,你的手也得包一下。”欣荣说。水波将咬伤的手用纱布包好。

这是一次沉重、致命的打击。第二天,欣荣发烧,而且热度不断升高,面颊通红,身体像烙铁,滚烫。水波取出药箱里的温度计一量,大惊:40摄氏度。“怎么办?”热度太高了,水波急得要哭出来。“别急,”欣荣安慰她。“你看看药箱里还有什么药?”

“只有治感冒的泰纳和治腹泻的黄连素,”水波将药箱翻了一遍。欣荣知道救生筏药箱里也只储备这些常用药。他服下二片泰纳,热度稍许退些,但很快又上去。他再服,就不起作用了。连着四五天高烧,欣荣再倔强也顶不住,除了喝点水,他不能进食。生鱼吃下去就呕吐。欣荣原本体格健壮,但救生筏上50多天的煎熬让他元气大伤,这多日高烧加之不进食使他人很快脱形。他时而清醒,时而昏迷。

水波急坏了,要知道他是为救她而受的伤。没有了他,她将如何是好?“小波,”第七天清晨,他睁开眼,拼足力气,示意水波:“解——解下来。”水波知道,他指的是绑在腰间、里面装着老船长笔记本的那根腰带。她将腰带解下。“小波,”欣荣直视她,双眼血红,一字一顿,“老船长让我带走;可我想,还是交给你。”“嗯,”水波想起老船长罗全布临终前的嘱托,想起老船长望着她的那狐疑的目光。“最后的希望就寄托在你身上了——”欣荣顿住,凝视着她。水波诚挚地说:“我你保证,只要我活着,一定会将笔记本带回去。将事实真相公之于众,为遇难的船员讨回公道;同时也为自己赎罪。”她说着脱下身上的衬衫,猛力撕下一块,然后拿起身边水手刀,将手指割破,用鲜血写了三个大字:我发誓!然后,将布条和老船长的笔记本放在一起,包好,放进腰带,郑重地束在腰间。欣荣眼窝里那道忽明忽灭的光熄灭了,眼角却溢出一滴泪水——年轻的水手长就这样走了。

印度洋的承诺

张士敏

